

宗教·教育·社会

吴梓明教授

荣休纪念文集

陶飞亚 刘 义·编

东方出版中心

宗教 · 教育 · 社会

吴梓明教授

荣休纪念文集

陶飞亚 刘义 · 编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教育·社会:吴梓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陶飞
亚等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3

ISBN 978-7-80186-944-9

I. 宗… II. 陶…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384 号

宗教·教育·社会——吴梓明教授荣休纪念文集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20 千

印 张:20.5

插 页:2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944-9

定 价:32.00 元

心系崇基中大四十年

—— 代序^①

一、引言

首先多谢崇基学院教职员团契,特别是伍渭文牧师的安排,让我退休前能与大家再会面,更多谢大家的拨冗光临,参加今日的欢送会。四十年不算太长,但实在过得很快。我十七岁进入崇基,当时是1968年,现在已进入2008年,原来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所以当伍牧师邀请我分享的时候,我立时便选上了这个题目:“心系崇基中大四十年”。四十年,真是不简单;在这四十年中,我有三十五年半是在崇基中大度过的,包括学习、生活和工作。我计算过,在崇基念本科四年,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已是四年制的大学,我主修“宗教”、副修“社会学”;跟着三年是在崇基神学院修读神道学硕士(Master of Divinity)课程,我是第一批入读这个课程的学生,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批获颁神道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之后,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读了两年教育文凭课程(1976-1978),教育学院大楼也是在崇基校园之内。所以,我在中大崇基的校园内总共花上了九年的岁月。随后,我亦获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聘为校外文凭课程兼任导师(1979年),再有三年(1979-1982)在中大教育学院担任兼职讲师(Part-time Lecturer)。1982年我有机会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修,第一年读毕文学硕士(主修教育)的学位课程(M. A. in Education),再花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Ph. D. in Education);我当时是打破了伦大教育学院学生三年内取得两个高级学位的纪录;

^① 本文乃吴教授于2008年1月22日及24日分别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讲“二十年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专题、及崇基校园基督徒教职员团契邀请作退休前分享“心系崇基中大四十年”之发言稿,获教授将两篇讲稿重新整理修订转载之,谨此致谢。

1985年我返回中大崇基宗教系任教，一直到现在，刚好满二十二年六个月。若是将这些数字全部加起来，即在这四十年间，我总共有三十五年半是在中大崇基的校园内成长的。

二、崇基的开始

还记得我最初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宗哲系的时候，有很多同学怂恿我转系，这个转系的风气多年来是没有改变的，但我却从没有想过转系；亦估不到，四十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宗教系（虽然学系的名称曾有改变，2004年开始已改称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有人问我为何会转读教育？其实我在读神道学硕士课程时，是兼修圣经研究及基督教教育两个范畴的，我的心愿就是要将基督教圣经的道理清楚地教育下一代。所以，我除了在本科时主修“宗教”、副修“社会学”外，在硕士课程中，我也是尝试主修“圣经研究”，副修“基督教教育”的。因此，“宗教学”、“社会学”及“教育学”也就成为了我一生所关注的三个课题了。在念硕士课程时，刚巧圣杰灵女子中学的校长班佐时牧师前来崇基神学组找兼职老师教圣经，当时神学组主任廖新民博士（Dr. Paul Newman）便推荐我去任教，一教便教了十年，先是兼职，硕士课程毕业后便改为全职老师。我也顺其自然地继续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修读学位教师教育文凭的课程，读完教育文凭后又获教育学院院长的错爱，建议我一边在圣杰灵教书、一边回馈教育学院作兼职讲师。于是，接下来的数年我是日间教中学、晚上返回中大崇基校园教授教育文凭课程的。当时，我想如果要继续在教育方面发展学术事业的话，我应该赶快修读一个博士学位课程。我于是又采纳了当时神学组主任潘应求博士及圣杰灵女子中学校长班佐时牧师的意见（他们都是伦大教育学院的校友），决定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修读博士学位课程。因此也可以说，我是从“宗教”转向“神学”、再从“神学”转向“教育”的；也是顺理成章地，我在伦大修读教育的时候，是主修宗教教育的。

在英国念第三年的时候，便收到神学组主任陈佐才法政牧师的来信，邀请我返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陈法政更将聘请讲师的广告寄来，注明是要聘请宗教教育科讲师，应征者必须获取宗教教育方面的哲学博士

学位。这是度身定制吗？我只好遵命，申请返回中大任教，这样一教就教了二十二年半。

三、心系崇基与中大

过去的四十年中，我有三十五年半是在中大崇基校园内度过的，先后住过神学楼二楼三楼、E座31室、S座2号室和A座1号室等。不单是我个人的成长，就是我家人（太太和两个孩子）的成长、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什么成就的话，肯定是与崇基中大有关系的。临退休前，或许也让我向大家忆述一下几件心中难忘的事件：

一、1960年代进入中大崇基读书，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再须穿过运动场，跑上半山上课。所以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靠近火车站的岭南运动场，因为每天都必须经过。我们每天都是要踩踏一片烂泥地，跑上山才可以上课的。那时，我已懂得不断提醒自己，要读书是不容易的。每日要坐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火车，还要跑过一段烂泥地，跑上山，才有书读。“既然是有幸进入大学校园里，就要珍惜机会，好好地读书，不要辜负父母、老师的期望啊！”

二、在崇基读书的年代，我留下最多踪迹的当然是神学楼及图书馆。二年级的时候（1969年），神学楼新楼落成，我们成为了入住神学楼的第一批学生；当时还未有顺利桥的小路，为了同学出入的方便，我们便自告奋勇帮忙搭桥铺路，现在那段路已修葺过，当然已好走得多了。我三年级时被选上担任宿生会会长（当时是吴利明教授当舍监、我当会长，十分凑巧），当年最深刻印象是在崇基图书馆搬书运动中有一项各单位出席率比赛，神学楼宿生出席率是98%，夺得全场冠军，那面锦旗现在仍挂在神学楼墙上。我也经常带朋友往神学楼参观，除了介绍一些早期的照片及锦旗外，还提及神学楼草地上的一块怪石头，上面刻有一个“隼”字，旁边有一棵高高的树，已经有三十五年的历史了。正因为那块石头和那棵树是1972年我们一班住宿神学楼的毕业同学特意留给母校神学楼作为纪念的。我们就是当年1972年毕业级“隼”社的同学。

三、在2001年，在崇基学院庆祝创校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曾经为母校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五十年来崇基学院的基督教教育》，以

贺母校的金禧纪念。在修订版的附录中,我又加上一篇文章:《我和崇基有个故事》。去年(2007年)是崇基创校五十五周年校庆,我追随梁元生院长,与他一同编制了一本英文书: *Christian Responses to Asian Challenges: A Globalization View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亚洲处境给予基督教大学的挑战与他们的响应)^①,总算我也为母校留下一些纪念吧!

四、伍渭文牧师吩咐我讲一下我在基督教大学研究的历程及心得。我读的是宗教教育,也不断思考有关教会办学的问题。正因为我是在崇基中大成长,崇基学院1951年创立时,是为继承国内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传统而办理的,很自然地我就开始钻研基督教大学教育的问题,并以崇基作为一个个案研究。在中大崇基读过宗教、读过神学,我亦很自然地会从宗教神学的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超越的上帝,上帝是超越者,这个思考方法很有意思。过去二十年,我是选择了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检视崇基学院的基督教教育。

若是借用本地维他奶广告的一句话:“点只咁简单。”我会说:“崇基的基督教教育点只基督教咁简单。”因为崇基强调的基督教精神是超越宗派、甚至是超越了宗教的框框。在崇基的校园内,我们不仅有基督宗教的研究——基督新教、天主教研究,也有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研究。最近几年,或许大家会留意到,在校园内多了些和尚、尼姑、道士,他们也一群一群地参加暑期研习班。我会说:这正是崇基作为基督教大学的特色。其他宗教大学很少像我们这样的开放,可以容纳不同宗教的人士为个别宗教举办培训班,所以是“点只基督教咁简单”。崇基学院的校牧室也是这样,伍渭文牧师对崇基学院、甚至对中文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的照顾也不只限于是基督教徒,信徒、非信徒也是校牧室关顾的对象,所以是“点只基督教咁简单”。

另一方面,崇基的基督教教育也是“点只一般教育咁简单”。现代的大学教育愈来愈专门化、学术化,追求知识的传授、钻研及创造,愈来愈少关注人的需要,甚至使人成为了学术竞争、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在崇基的校园里,我们多少也受到一些基督教气氛的熏陶,也会关顾我们的生命、成长,表达我们对心灵成长的关顾。

^① 两本书均是由崇基学院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出版。

有学者喜欢用“世俗化”这个社会学的理论去描述近代基督教大学的演变历程,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因为“世俗化”的理念比较负面和不够全面,我较喜欢从“基督教教育现代化”的角度去理解,这样才能看出崇基的基督教教育是“点只基督教咁简单”,也是“点只一般教育咁简单”。

四、二十年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很多人问我:为何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是偶然的吗?抑或是上帝的安排?这也许亦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刚才我的解释是:我念大学的时候主修宗教研究、副修社会学,后来又读神学,再转到教育学院,我一直都关心宗教教育和教会办学的问题。1985年,我刚完成博士论文回港履新,本是想在中文大学专心钻研香港的教会办学及学校宗教教育的课题,但是因为香港面临九七回归的问题,很多学者开始面向中国内地,因此,研究香港教会办学的问题也不能离开在内地教会办学的一段历史经验及思考,所以我亦开始主动地读中国历史(又从“教育”转到“历史”了),尤其是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等。1989年1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他发给我一封邀请信函,我便毅然应邀参加了。这确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让我能够接触更多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者,从那时候开始,我便一直专注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研究。若是由1989年开始算,也差不多有二十年,所以我也可以藉此机会向大家报道二十年来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情况吧!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研讨会是称为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其实1987年在四川大学也有一个较小型的研讨会,他们称之为筹备委员会研讨会。那次推选了章开沅教授扛大旗,所以武汉的会议便算是第一届。^①

1989年5月31日至6月3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我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唯一一位香港学者,所以依

^① 参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亦可参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据章开沅教授的说法,我是最早参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香港学者。我初到武汉的时候,也曾尝试在书店寻找一些有关基督宗教学术研究的书籍,却是一本也找不到。现在不到20年,大家已可以随便在内地的书店找到有关宗教学术研究的书籍,也有不少是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书籍及学术文章。所以,大家可能很难想象20年前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从空白开始的。我初时认识几位老学者——包括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苏州大学的张梦白教授、复旦大学的胡景钟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陈增辉教授等,都是以前教会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年纪有多大,大家可以推算之;事实上,现在除了章教授以外,其他都已经去世了。当时,我遇上这些前辈学者非常开心,他们告诉我,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搜集,其次是如何引起年轻学者研究的兴趣。因为得到内地一班前辈学者的鼓励,我便立下决心致力推动有关中国基督教大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在这两方面尽上一点绵力。

1991-1992年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来第一个的安息(休假)年,我便计划走访美国(在东岸耶鲁大学住了半年,也在西岸加州太平洋神学院留了半年)。我特意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斯坦福大学的档案馆,了解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档案文献的收藏情况。在耶鲁大学搜集资料期间,刚巧遇上当时在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的章开沅教授和马敏博士,分别与他们共同撰写了两篇文章:《中国教会大学研究近年在大陆的发展》及《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在美国收藏情况简介》,我亦很幸运地能与章教授合作完成一篇英文文章,帮助他向Henry Luce Foundation申请资助,也达成他的心愿: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①。留美期间,我还有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自前往新泽西州拜会当时还健在的柯乐智博士(Dr. Archie Crouch),他是《基督教在中国——美国图书馆、档案馆所藏文献指南》(*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① 参 Zhang Kai Yuan & Ng Tze Ming Peter,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vol. 15, March 1993, pp. 118-128. 及吴梓明、马敏:《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在美国收藏情况简介》,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6期,1993年9月,第180-198页。

Inc., 1989)那本书的作者^①,我很佩服他花了十多年时间编写那本书,所以希望聆听前辈在搜集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文献的宝贵经验,以便着手计划及推动有关中国基督教大学文献目录研究的工作。柯乐智博士给予我很多宝贵的意见,终于我决定返港后筹办一个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我更有幸从柯博士手中获取他的一份手稿,于是我邀请了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后来改称为“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吴小新博士共同翻译该文,并将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档案文献在美国的收藏情况,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内作些报道^②。

1990年代初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实在不容易。在内地必定会遇上很多问题,在香港也是有困难的。内地的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因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宗教有关,内地一直不鼓励人从正面去研究有关宗教的课题;二是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是十分敏感的课题;三是它也涉及学生运动,这也是属于十分敏感的研究课题。所以内地学者一直不愿直接去研究教会大学的历史的。香港又如何?1990年代初,中大的学者也有不少视内地研究为十分敏感的课题,容易受到政治审查,最好不要触碰它;另外,当时也有同事认为内地学者的水平参差,甚至不符合国际水平,所以,与内地学者打交道是将自己的学术水平降格,我当时也受到一些批评。总之,当时在中大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也是有困难的。幸好“九七”之后,形势大大改变了。

1993年12月,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了一个“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获邀出席的学者们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中外学者共60多人,其中宣读论文者有40多位^③。在会上,学者们深深体会到要透彻了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就必须翻查有关的档案及历史文献,因此对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及文献的分布及储藏情况的认识便是十分重要的了^④。为了进一步鼓励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于是与刚回中大任教的梁元生教授携手,亦联系了内地有

① 柯乐智博士曾编撰:《基督教在中国——美国图书馆、档案馆所藏文献指南》一书,参 Archie Crouch, *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9。

② 参吴小新、吴梓明合译:《编撰〈基督教在中国〉全世界所藏文献指南的模板》,刊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9期,1995年3月,第106-112页。

③ 有关报告可参阅吴梓明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 吴梓明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

关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共同搜集有关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的资料,并于1996—1998年间合力出版了共五辑《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为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基础性的资料指引^①。这是推动中国学者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步。

1994年3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行了另一个“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其中一群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学者,相聚间谈及中国内地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尤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专书研究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课题方面作学术研究的更少。有见及此,学者们建议彼此合作,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先后出版了七种,分别是:

1.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2.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3.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4.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5. 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6.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7.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②

这项丛书出版计划,其实也标志着另一个开始,是内地、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也是第一次由香港一个宗教机构赞助、由内地一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教育丛书。丛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挑选了一些重要的专题作研究,是有关“国学研究”、“神学教育”、“华人校长研究”、“女子高等教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研究。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学术水平仍有不足之处,但相对于1990年代初内地的学术水平来说已算不错,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引发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究。

^① 参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共五辑),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1996—1998年。

^② 该丛书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2002年陆续出版。

五、研究方向的寻觅

中西文化交流

从1950年代初以来,大陆学者一般都只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评价中国基督教大学,将基督教大学视为西方霸权在中国境内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基督教大学并不负起任何正面的角色。但自19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不断的改革和开放,内地学者在学术思想上开始享有较大的自由,可以逐步冲破过往的历史成见。学者们开始重新肯定“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的重要。在武汉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已经明确指出,他说:“毋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经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出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出来。”他又补充说:“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①章教授随即建议学者们可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的基督教,这当然不仅是关乎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也不只是限于基督教大学的活动吧。

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199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亦多是从较正面的角度及采取较积极的态度看待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并且尝试将中国基督教教育史放

^① 参章开沅:《序言》,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4页。

回中国历史或中国教育史的范畴作研究。譬如高时良主编之《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黄新宪之《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及王奇生之《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也有学者是着重从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作研究,譬如史静寰之《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何晓夏与史静寰合撰的《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王立新之《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明显地,他们已经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检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更加客观、科学化地看教会大学在促进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上所扮演的角色。

西方冲击中国响应 vs. 中国冲击西方响应

我相信大家必定熟识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的“冲击与响应”(Impact - Response)研究范式,按费教授的理解,西方的基督教教育对近代中国来说可算是一种冲击,它也必然会引起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响应。但这种“冲击与响应”的研究观点其实亦可以从相反的方向看的,换言之,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处境也可以是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教育带来另一种的冲击,逼使西方传教士也必须对中国的冲击作出相应的响应来。譬如: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所设立的大学可以被视为传教士将西方的教育搬进中国来的一项尝试,但在中国却遇到了社会及文化上很大的冲击,为了响应中国的冲击,传教士也在不断的修订他们办学的宗旨及方向。因此,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演变也可以被视作是传教士面对中国冲击的一种响应。事实上,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也有不少因着与中国人士的接触交往而被改变过来。近代学者也尝试从这相反的角度去研究,较突出的研究是连曦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传教士的改变——在华美国新教差会中的自由主义》^①,论文中清楚描述了几位西方传教士来华接触中国社会的宗教和文化后,是如何将他们对自身来华宣教的想法逐渐改变过来的。他们本想改变中国,却最终被中国改变了^②。

^① 参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the Missionaries-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连博士是专门研究三位传教士在中国的转变,即是胡美(Edward H. Hume)、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和赛珍珠(Pearl S. Buck)三人。

自1996年开始,我与梁元生教授及两位内地学者(复旦大学的徐以骅博士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静寰博士),亦尝试从这样的角度、就四个不同的分题展开有关中国教会大学的深入研究。这四个课题分别是:(一)神学教育;(二)宗教教育;(三)国学研究及教育;(四)爱国主义教育等。研究的成果是出版了一本英文书,Ng, Peter Tze Ming et al,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 - 1950*.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这项研究也是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确可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相反方向研究的一个具体个案^①。

西方元素 vs. 中国元素

过去学者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时也多是侧重看传教士或西方差会的历史,因而忽略了华人教会的历史发展研究。在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学者们多是视中国教会大学为西方传教士的宣教机构之一,将其定位为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西方教育体系,却忽略了这些基督教大学本身也有许多属于中国的元素。因此,在推动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同时,我也着意地突显出研究有关“中国元素”的重要性。在1997年,刚巧徐以骅博士及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博士同在香港,我们三人共同开展了一项有关“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的计划。我们先后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参加,分别探究中国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践的情况。这些华人校长的身份比较特别,他们均须面对至少三方面的冲击。其一是他们身为华人信徒,必须在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带来的冲突问题中寻求解决的方案。究竟他们如何能在持定“中国人身份”的同时,亦能坚守其“基督徒的身份”呢?其二是身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他们必须面对教育工作给予基督徒的挑战。究竟他们是如何处理“对教育专业的委身”与“对基督教信仰的委身”二者带来的冲突问题呢?其三是他们身为华人校长,必须面对“为基督教信仰服务”与“为国家或当地社会服务”之间带来的冲突问题。究竟他们是如何面对中国政府与基督教会或差会给他们的压力呢?事实上,华人校长的研究更能

^① 该研究项目已经完成,并以英文专书的形式在美国出版,见 Ng, Peter Tze Ming,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 - 1950*.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帮助我们看到教会大学不完全是西方的东西,更是很重要的中国元素,并且是愈来愈中国化,我们更加需要从华人信徒的角度看,才可以清楚了解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①。

传教士研究 vs. 华人信徒研究

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博士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司徒雷登与狄考文在华的教育活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天津南开大学王立新博士的论文也是研究“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但近年更多见到的是华人信徒的研究。因为在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华人信徒研究中,会更容易找出有关的“中国元素”。譬如:我有一位研究生研究的是燕京大学的早期华人教授——刘廷芳^②。刘廷芳是浙江省温州永嘉县人,父母均是中国人,他当然也是个中国人;但刘是出身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已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也不讳言自己生下来便是个基督徒。他这双重的身份都是与生俱来的,对刘廷芳而言,他必须同时拥有这与生俱来的“双重身份”。刘的一生正好是见证了“基督徒”与“中国人”两种身份的一个完美结合吧。

另一位学生是研究金陵大学的学生——陶行知。陶行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本来的名字是“陶文浚”,后来因为坚信“知行合一”的理想,改名为“陶行知”。一般学者或会承认陶行知的基督徒身份,或是说陶行知只是曾经一度成为基督徒,其实综观陶行知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基督徒,并没有断言放弃过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且他也一直是积极参与基督教群体的活动者。我的学生在其研究过程中,也找到了不少有关陶行知与基督教机构相联系的资料,及他在基督教出版物中发表过的文章材料,帮助学者重新发现这位基督徒教育家的身份及工作。陶行知既然相信基督教,自然地会在他的言行中流露出他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来。事实上,陶行知所推崇的教育也正是一个中国(本色)化

① 参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参吴昶兴:《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的实践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除了有关基督教大学人物外,当然也有是关乎中国基督教会内的华人信徒研究,譬如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及东南亚华侨教会的拓荒者黄乃常等。读者亦可参阅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0-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及朱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砂拉越华人美以美会社区的个案研究(1901-1951)》(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的基督教教育。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自然地，陶行知所致力推动的平民教育也正是一种活现爱心的教育。所以可以说，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理想真正是一个结合中西文化、落实基督教教育理想的中国化表达^①。

另一位学生研究的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许地山。许地山不单选择了信奉基督教，他也进入神学院深造，但他却娶了一位佛教徒女子为妻子。许地山也专门研究中国的宗教，曾发表过很多有关佛教、道教的著述文章，甚至连外教徒学者也十分接纳、欣赏，并且推崇他的学术成就。他如何能平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二者，尤其是以宗教学者的身份，处理有关多元宗教的问题，譬如“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关系等问题，如何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近代学者所关注研究的课题^②。许地山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吧。

我还有另一位学生是研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教授的。陈垣虽是一位基督新教信徒，他却担当了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之职。更是由于陈垣热衷宗教学术研究，他常以“宗教研究者”自居，但在他的宗教研究中，却处处表现出他的个人宗教信仰是属于一种开放的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并不否定中国文化、且更是具有广阔的宗教文化关怀的一种信仰^③。这些博士生的研究中，亦明显地见证着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中，确是蕴藏着很丰富的资源，让我们可以探究有关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结合的问题、华人信徒可以如何具体地将他们的信仰落实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处境中。这些都可以成为现代学者可以继续探究的问题。

世俗化 vs. 现代化

近代学者喜欢引用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宗教的历史，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常被学者引用的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观念。较早期是 Jessie Lutz 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已是借用世俗化的理念来描述中国教会大学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的转变。David Vikner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同样是用世俗化的观念来描述教会学校在香港的转变经验。其实，中国学者也是引用这样的观念的，最近常引用的是刘家峰博士，在他近期的

① 参何荣汉：《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 2002 年。

② 参陈伟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相遇——许地山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 2002 年。

③ 参刘贤：《陈垣之宗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 2005 年。

文章中亦可见到(早前高时良、史静寰、徐以骅也有引用)。相对于这种看法,其实我在199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亦有介绍过另一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①。近代学者亦已发现“现代化”的观念是比较中性及正面的看法;“世俗化”的观念却是比较负面及不完全的看法。因为“世俗化”的理论不足以帮助学者理解现代社会的演进,已有不少学者放弃了用这样的理论。为了继续鼓励学者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我在2003年开始提出了另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或者比较跨学科性的概念,即是“全球地域化”的概念。

全球地域化研究

为甚么选择这个新的概念,即是“全球地域化”的概念呢?

近代不少学者正鼓吹必须从普世基督教运动的角度去研究及教授基督教的历史。昨天在中大演讲的英国学者 Andrew Walls 亦提出了“Non-Christian West”和“Non-Western Christianity”的新概念。他亦曾指出:在基督教传教史中常提到的“国度意识”(Christendom)有地域扩张的含意,带有欧洲基督教王国领域扩张的意思。Walls 亦指出这种意识并不是未来基督教运动所必须具备的元素(现在已进入了 Non-Western Christianity 的年代,事实上,当基督教传入非洲及亚洲社会中,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超越了这种“国度意识”的观点了^②)。在检视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曾引起了中国人强烈反教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的色彩和领域扩张的意识。现在,我们可以从“普世基督教运动”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这必定有助我们跳出传统基督教“国度意识”的历史观点。事实上,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时候,我已发现中国的基督徒学者,早在1940年代初期已提出了这种“普世基督教运动”的概念。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武汉华中大学的校长韦卓民教授,他曾率先肯定了基督教运动是一种普世性的运动。韦教授更建议

① 譬如参:“Secularization or Modernization: Teach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Since the 1920s” in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vol. 5, Part 1, 1999. pp. 1-17. 及《从神学教育到宗教研究——燕京大学宗教教育的考察》,刊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2期,1999年10月,第49-66页。

② 读者可参 Andrew Walls. *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Edinburgh: T. & T. Clark, 2002, p. 195。